

论独生子女政策的社会起源

陈恩

【摘要】通过理论梳理和史料分析,独生子女政策的出现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个政党或某些精英的所为,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独生子女政策旨在对国家的人口进行计划控制,这种试图使人口变化遵循人类计划的努力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逻辑,因此,现代性才是独生子女政策的根源;第二,近现代中国社会形成的对科学宗教般虔诚的态度也是独生子女政策获得精英和普通民众支持的动力来源,独生子女政策的整个论证过程都在科学的名义之下;精英们之所以相信独生子女政策能够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因为此时我们已经掌握了使人口清晰化的人口统计技术和对人们的微观生育过程实施控制的避孕节育医学技术。

【关键词】独生子女政策 社会起源 计划生育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2)03-0140-05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人口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简称《公开信》),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在全国全面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社会起源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须先解答如下问题:计划生育思想是如何产生?中国又是如何将计划生育思想转变成政策付诸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计划经济产物吗?控制人口的计划生育思想被付诸实施需要什么技术条件?

一、计划生育:现代性的逻辑产物

计划生育政策有其思想渊源。精英们主张根据人口计划来控制生育,是基于他们对人口增长及其理想目标的主观判断,这种判断是建立在他们认为他们对人口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准确把握上。那么,他们对人口及其影响因素把握的自信是如何产生的?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在科学技术上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哈耶克认为,每个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都加强了人类在判断自己的理性控制能力上的一种幻觉,称之为“致命的自负”。^①在哈耶克看来,一切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计划的企图,不管它们是出于何种高尚的动机,都是建立在这种危险的知识自负上。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则用“园艺”来比喻这种理性控制精神,园艺师将一个自然场所加工成为完全

人工设计的有秩序的植物空间,而现代人试图完全根据其意图来重新塑造人类社会。^②斯科特认为,这种强烈而固执的自信是一种极端现代性意识形态,精英们特别相信,随着科学地掌握自然规律,人们可以理性地设计社会的秩序。^③现代性试图使一切理性化,变得可计算、可预测、可控制,计划是现代性的产物。计划生育思想处在这种现代性思想脉络中,计划生育政策是国家精英们试图以理性计划控制人口增长的努力,使人口增长成为可以计划控制的对象。独生子女政策设计的思想基础是,精英们把人当作没有社会性的物理体或生物体,缺少人文主义的考虑,对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行直接配额控制。计划经济是人类对理性化追求的极致表现,计划生育试图使人类最微观最原始的生育行为变成国家计划控制的对象,更是极致中的极致。

计划生育政策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同时成为计划经济的一部分。1954年,邵力子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

① [英]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② [英]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③ [美]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次会议发言时说“社会主义什么都有计划，生育更要有计划。”^① 1956年，毛泽东在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谈话时说：“夫妇之间应该制定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我们为什么不可对人类本身也实行计划生育呢？”^② 被誉为“计划生育之父”的马寅初在1957年说：“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能成其为计划经济”。^③ 1970年6月，周恩来在接见卫生部军管会全体人员的谈话中指出：“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加都计划不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④ 1972年7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成立后，会同国家计划委员会开始编制国家人口年度计划，并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之中；1973年开始，国家每年在下达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同时下达年度人口计划。1949年以来从计划生育思想的最早提出，到独生子女政策的酝酿出台，都与计划经济相关联，计划经济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基本依据。

计划生育思想是建立在精英们对人口规律过分自信的基础上的，这可以从被称为“独生子女政策总设计师”的宋健对人口预测和规划的“自信”中看出。精英们坚信他们认定的中国人口规模的理想目标和人口增长的未来轨迹。精英们对其预测能力的自信，可以从他们所使用的“预报”人口而非“预测”人口中看出，^⑤ 预报意味着对未来准确结果的提前告知，而预测只是对未来事件发生概率的估计。精英们是基于对其人口预测能力的自信而用“预报”一词，还是为了使人们增加对精英们人口预测能力的信任而使用“预报”一词？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反映了人类对其预测能力的超强自信。如果精英们是为了增强其政策合法性而故意夸大其预测能力，那么，可以说明人们存在对人类预测能力的自信；如果精英们是无意识地使用“预报”一词，则可说明精英们对其预测能力的自信。独生子女政策试图把人口变化完全纳入预想的轨道，使人口增长的过程和结果都处在国家计划的完全控制中。这体现了精英们对其预测能力和控制能力的自信。无论是人口规划还是计划生育，都体现了精英们的理性化精神。

二、科学信仰：独生子女政策的合法性来源

独生子女政策作为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生育配额控制政策，该政策的制定者和论证者如何说服其他国家精英和普通群众？根据梁中堂的考证，1978年10月中央

69号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1979年1月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要求“对于生第二和二胎以上的，应从经济上加以必要的限制”，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的产生。独生子女政策产生后备受争议，全面地推广更面临着巨大阻力。于是，决策推动者需要赋予独生子女政策以合法性，他们首先找到的是“科学”。一批从事控制论和系统工程专业的“七机部”二院工程师与西安交通大学从事计算机专业的教师，成为决策推动者寻找的科学论证依据的提供者。1980年2月14日，国内各大报纸刊发新华社通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研究首次对我国未来一百年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多种测算》，这既为已经在部分地区推行一年多的独生子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又为同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信》要求全国普遍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作了“科学”的铺垫。为什么独生子女政策的决策推动者要从“科学”那里寻找政策合法性呢？

在现代社会，科学被人们看作无所不能的工具，科学使人类可以根据自己意志去改造世界。这种对科学的态度称为科学主义，是一种对科学技术宗教般的信仰，认为科学（甚至技术）是唯一真理。美国人类学家苏珊认为，中国“一胎化”政策起源于科学主义。^⑥ 那么，科学信仰在中国是如何产生的？“科学”（往往与“技术”相混用）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被精英们看成拯救中华民族国家危亡的唯一路径；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历史和文化等因素，“德先生”（民主）在中国遭到争议；而“赛先生”（科学）则显得更加突出，精英和普通民众都把科学（甚至技术）当作真理的唯一来源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办法，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精英们和普通民

① 邵力子：《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4年9月18日。

②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③ 马寅初：《新人口论》，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④ 《中国计划生育全书》编辑部：《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人口和计划生育的论述》，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⑤ 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4页。

⑥ Susan Greenhalgh, *Science,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29, No. 2, (Jun. 2003), pp. 163-196.

众对科学技术达到近乎迷信般的信仰，人们对大学教授和任何学科的科研人员都十分景仰。在信息相对封闭的1980年前后，人们包括精英们对“控制论”、“系统工程”等这些科学名词抱以宗教般的虔诚。1980年2月14日的新华社通稿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研究”、“采用世界科学界公认的人口预测方法”等科学名义向全国人民宣布：“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危难的关头和别无选择地必须走‘一胎化’的道路”。^①政策论证者把独生子女政策和“科学”联系起来，以复杂的数学模型和先进的大型计算机预测未来中国人口，使独生子女政策获得科学合法性。实际上，宋健等研究人口控制所用的“控制论”是一种控制自然的工程学方法。人口的预测和独生子女方案的论证被封在贴着“科学”标签的黑箱里，罗马俱乐部的“增长极限”理论和美国的“人口爆炸”理论使人们更加坚定相信中国科学家所警告的人口危机，“科学”使人们相信独生子女政策具有不言而喻的合法性，怀疑独生子女政策即怀疑科学本身。

现代科学是建立在数学的基础上的，数学语言被认为是一种科学语言，人们往往把定量的东西等同于“科学”。从事导弹研究的七机部二院工程师们能够获得当时罕见的一般只应用于军事武器研究的大型计算机。大型计算机能快速准确地运算大量数据和建立复杂的数学模型，这是当时国内社会科学家难于想象的。在那个迷信科学（甚至迷信技术）的时代，甚为罕见的“计算机”被人们符号化为“科学”本身，计算机算出的结果也被认为是科学的。1979年12月，在第2届全国人口理论研讨会上，宋健领导的研究团队使用复杂的数学模型和新奇的计算机技术预测未来百年中国人口的增长，使与会的官员和专家学者们很震惊。作为与会专家的梁中堂回忆，“李广元在会议闭幕前的那次大会发言介绍用控制论和系统工程方法预测人口时，坐在大会主席台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栗秀珍是如何用一种欣喜的表情倾听和关注。”^②在中国，人们往往把“科学”等同于“技术”和定量的数学运算。在独生子女政策的合法性论证中，“控制论”、“系统工程”、“世界科学界公认的人口预测方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研究”、“计算机”等等被符号化为科学真理的东西，成为政策推动者说服精英和民众的法宝。

三、医学技术：身体控制的微观基础

独生子女政策的最终落实在于对已婚育龄夫妇（特别是妇女）进行节育控制，通过对育龄人群的身体进行自律和他律来达到生育配额计划控制，身体控制是为了

节制生育。如何控制人的身体（准确地说是生殖器官）成为独生子女政策得以实施的关键条件。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身体摆脱传统伦理和秩序的专断统治，但是同时中国人的身体也日益国家化，国家对国民身体的控制日益增强。^③其实，这种身体控制也局限于对人的身体进行外在纪律约束，使身体符合国家所认为的文明规范，而大规模地对人的身体某部位生理功能进行不可逆的改变从未出现过。清末民国，一直以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为身体开发的依据，在国力、国权成为主要价值所在的情况下，身体的欲望成为首先需要节制的对象。^④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等国家至上观念、意识和制度不断地强化身体国家化。1980年9月，《公开信》将独生子女政策拔高为“一项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前途，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国人民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重大措施。”于是，节制生育的身体控制变得理所当然。而身体控制特别是生殖器官的控制和监测都依赖于医学技术的发展。人口层面的身体控制最终还会落实到个体层面上的身体控制。精英们认为，控制人口首先必须控制生育，生育控制包括预防、监测、终止和绝育等一系列环节，因此生育控制也是对入（特别是妇女）的生殖器官进行控制，这种控制依赖于一系列的医学技术，包括预防非意愿怀孕的避孕节育药具、监测怀孕的检测技术、终止妊娠的人流手术和排除后患的绝育技术。在前现代社会，也存在避孕节育的方法，但這些方法只是基于人们长期的经验积累总结，并不是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上的技术，体外射精、安全期性交等可能是前现代社会的主要避孕方式，而橡胶避孕套、避孕药、绝育手术是在现代科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技术手段。这些避孕节育技术日益摆脱经验概括，而与现代医学、生物学、化学等科学结合日益紧密，也属于现代科学与技术发展脉络中的一部分。现代避孕节育技术的发明推广为国家控制人的生殖器官提供了技术可能性。

1960年代，国家开始组织避孕药具的科学研究。1964年7月起，我国试制成功的口服避孕药陆续供应临床；1967年10月，我国正式生产两种口服避孕药；1970年12月，短效口服避孕药正式批准生产；1972年

^①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进行研究 首次对我国未来一百年人口发展趋势作了多种测算》，《人民日报》1980年2月14日。

^② 梁中堂：《“一胎化”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http://liang-zhongtang.blog.163.com/blog/static/1094265082007317104216897/>。

^{③④} 黄金麟：《近代中国的军事身体建构，1895~194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3年第43期。

又生产了TCu200、VCu200宫内节育器；随后，一大批避孕药和宫内节育器相继通过鉴定投入生产。^① 避孕方法只能减少非意愿生育，国家对身体控制要想达到理想效果，使生殖器官时时刻刻处在国家的有效监控之下，绝育技术彻底堵住了个人逃避监控的可能和解决了国家权力不在场发生孕情的可能。1958年，后来被称为“补救措施”刮宫术和负压吸引人工流产术在我国已经发展成熟。而彻底解决国家不在场管制生殖器官的绝育技术成为计划生育重点攻关的措施。独生子女政策出台前，我国的绝育技术也已经成熟。早在1950年代，输卵管结扎术在国内已有临床应用；1964年，全国计划生育学术会议将抽芯近端包埋法作为我国通用的标准结扎法；1970年，推广复辟小切口输卵管结扎术；1970年被收入《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的输精管绝育方法就有10多种。^② 绝育技术能堵住那些试图超越计划规制的生育，作为“补救措施”的人流引产使国家能够把“计划越轨者”的企图消灭。在一胎化政策出台前后，我国已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避孕节育医学技术体系，包括了避孕技术、绝育技术、终止妊娠技术及妊娠监测技术。这些对生殖器官进行控制的技术发明，使政府根据计划配额直接控制人口生产成为可能。在当时中国的医疗条件落后情况下，农村地区更不具备外科手术的专业力量。于是，全国各地政府通过向农村派出了宣传队和避孕节育手术队，进行大规模巡回集中手术，尽管也出现一些令人遗憾的医疗事故和后遗症，但是身体控制医学技术几乎覆盖了全部已婚育龄人群。

四、人口统计：国家治理的权力技术

控制人口增长的前提是政府掌握了辖区的人口规模、人口结构的现状和趋势。精英们相信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和结构存在理想状态（如“最优人口”、“适度人口”），控制生育是为了达到理想的人口目标。对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和结构的掌握依赖于人口统计技术的发展。独生子女政策被精英们当作实现中国理想人口目标的唯一办法，因为他们对当时中国人口的数量和未来人口的变化路径有相当自信的把握，这种把握是建立在人口统计技术的基础上。人口统计是实现国家治理“清晰化”与“简单化”的重要权力技术。清晰化是指“将极其复杂的、不清晰的和地地方化的社会实践取消，而代之以他们制造出的标准格式，从而可以集中地从上而下加以记录和监测”；清晰化以简单化为前提，“简单化……只表达了官方观察员所感兴趣的片断”。^③ 通过简单化和清晰化策略，使以前未曾掌握的情况呈现在政府视野之

内，成为可操控的治理对象。“人口统计”是典型的国家清晰化和透明化的权力技术，它使治理对象更加清晰地呈现在国家的视野里。人口统计使国家在技术上能够弄清楚所辖国土上的人口数量、结构、分布、迁移等资料，使人口变得可计算、可预测、可控制。

在独生子女政策出台前，我国的人口统计技术体系已经基本具备。1949年后，我国政府通过一些措施逐渐地形成了对人口状况的掌握。1950年~1960年代，我国人口的总数、生育、死亡、避孕、节育、婚姻等方面的统计数据分别由公安、卫生、民政等部门负责。1953年和1964年分别进行了两次全国人口普查，并且一直实行严格的户籍登记制度。1951年7月公安部颁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1953年，新中国进行第一次人口大普查。1955年6月9日，国务院通过的《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经常性的户口登记制度，户口数字应每年层层上报，最后汇总于内务部。到1956年2月国务院又颁布指示，把全国的户口登记管理工作及人口资料的统计汇总业务，全部交给公安部门。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户籍制度对所辖住户的基本状况进行登记（包括常住人口登记、暂住人口登记、出生登记、死亡登记、迁移登记、变更登记、更正登记等），并根据登记资料进行人口统计。当时我国的流动人口非常少见，所以当时人口普查和人口统计数据可能是比较准确的。人口统计技术使国家史无前例地准确掌握辖区内人口的总数、生育、死亡、避孕、节育、婚姻等方面情况，治理对象变得日益清晰。

独生子女政策的论证是在既有人口统计数据基础上进行的。宋健等认为，决定人口发展变化的关键性参数是人口死亡率、妇女平均生育率和现在人口的初始年龄分布，他们已经有比较准确的统计资料可以利用。^④ 根据梁中堂回忆，“据李广元同志说，宋健回国后就把国外带回来的一摞人口预测的资料甩给了他。从此，李广元开始了跑国家统计局、公安部，和在计算机上测算中国人口的研究工作。”^⑤ 也就是说，宋健领导的研究团队进行人口预测并论证独生子女政策所需要的人口数据主

①②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年版，第479~480、481~482页。

③ [美]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④ 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114页。

⑤ 梁中堂：《“一胎化”政策的时代背景研究》，<http://liangzhongtang.blog.163.com/blog/static/1094265082007317104216897/>

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数据和公安部户籍登记数据。统计技术为精英们提供了人口数据,使人口变得可计算、可预测。197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一些县市的基层为了掌握妇女的婚姻、生育、避孕、节育等情况,开始摸索建立了一些计生登记簿,并逐步形成了计划生育帐、卡;内容包括夫妇基本情况、结婚时间、生育子女数、人工流产史、避孕节育方法、未避孕原因等。^①在独生子女政策全面推开之前,基层地方政府已经发明了使辖区内育龄人群变得清晰的人口统计技术。

五、结语

独生子女政策在中国出现具有逻辑必然性。现代社会的理性逻辑强调人类对自然和社会进行干预,而且人们对人类了解自然、社会和根据人类的意图去重塑自然和社会的能力相当自信。控制人口是现代性发展的必然结果,精英们相信一个国家存在理想的人口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理想目标,需要进行规划和控制。独生子女政策就是在这种理性逻辑发展脉络中产生的。并且在1949年后,中国大陆建立了全面的计划经济体制,把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纳入国家计划。精英们一直在试图对中国的人口再生产进行计划控制,但直到独生子女政策出台之前仍不能实现。从一开始,计划生育思想和政策都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并构成计划经济的一部分。独生子女政策只不过是把人口再生产纳入极具控制力的计划配额控制体系。从这个角度讲,独生子女政策是计划逻辑的必然产物,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逻辑结果。

独生子女政策不仅要控制人们的生育行为,还把人们的生育数量限制在一胎内,这是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决策。因此,决策者和政策推动者需要说服其他国家精英,因为控制人们生育数量的决策需要政治勇气;并且,决策者还要让普通民众接受这一政策。在中国具有不言

而喻的合法性地位的“科学”成为国家精英们求助的对象。科学信仰成为独生子女政策的合法性来源。

独生子女政策的落实必须依赖一系列控制人们生殖器官的医学技术发明。在独生子女政策出台前后,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避孕节育技术体系,包括预防非意愿怀孕的避孕节育药具、监测怀孕的检测技术、终止妊娠的人流手术和排除后患的绝育技术。这些技术发明贯穿了整个生育控制过程,使国家能够实现对人们的生育数量、时间和间隔进行无所不在的控制,使人们的生育行为成为国家计划控制的对象。

独生子女政策论证和实施都需要了解当时人口和预测未来人口。而掌握当时和未来人口所需要的人口统计技术在当时已经具备。精英们相信他们已经掌握了国家的当时人口和未来人口,并且能通过人口统计随时掌握人口的出生、死亡和增长的情况,也就是这些人口清晰技术使精英们对独生子女政策的设计、论证和执行都满怀自信。

总之,独生子女政策的社会起源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理性和科学,现代性使中国精英们对根据人类的意图去重塑社会的能力迷信,并且生殖器官控制技术和人口清晰技术为国家控制人们的身体提供技术上的可能性。当然,笔者强调现代性作为独生子女政策的社会起源,并不否认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在独生子女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中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2010级
博士研究生、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马光

^①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史》,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年版,第525页。

The Social Origin of One-child Policy

Chen En

Abstract: Through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this article reveals that one-child policy can not simply be attributed to some party or elites. As a policy of birth planning, one-child policy aims to control the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this attempt reflects the rational logic of modern society. Therefore, modernity is the source of one-child policy. Secondly, the religion-like attitude towards science 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 is also a reason why the elites and ordinary people support one-child policy. The justification process of one-child policy is under the name of science. The elites believe that one-child policy could effectively control population growth, because at this time we have mastered the demographics technology and the medical technology of the birth control.

Key words: one-child policy; social origin; birth planning